

明代名人年譜

續

編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輯

明代名人年譜續編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代名人年譜續編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輯.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13 - 4879 - 4

I. ①明… II. ①國… III. ①名人—年譜—中國—明代
IV. ①K820.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31206 號

責任編輯: 張愛芳

封面設計: 紅 焰

書名 明代名人年譜續編(全十六冊)

著者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輯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275.25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879 - 4

定價 5600.00 圓

論明人年譜的價值和利用

記載歷史人物事蹟、言論的年譜，是研究歷史人物以及其他歷史問題的重要資料，很值得重視，而明人年譜尤其值得重視和利用。

明人的年譜價值甚大，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

其一，多半篇幅龐大。將明人年譜篇幅與《明史》的相關傳記相比，可以充分顯示這一狀況。茲舉數例。項德楨編《太師楊襄毅公（博）年譜》殘本（筆者按：全本為十卷，僅存二卷）約七萬二千字，而《明史》之楊博傳約二千三百字，前者約為後者的三十一倍；胡博文編《畢司徒東郊先生（懋康）年譜》約四萬字，而《明史》之畢懋康傳約五百六十字，前者約為後者的七十一倍；齊祖名編《蓉川公（齊之鸞）年譜》約二千一百字，而《明史》之齊之鸞傳約九百字，前者約為後者二倍多；吳國英編

《環谷先生（汪克寬）年譜》約三千字，而《明史》之汪克寬傳約二百三十字，前者約為後者的十三倍。明人年譜篇幅大，包含的內容自然就多，價值自然會大。

其二，總量多。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是筆者所見著錄年譜最多的一部目錄書。據該書統計，先秦人物的年譜為五三二部（譜主八十六人），秦漢人物的年譜為一四四部（譜主五十二人），三國兩晉南北朝人物的年譜為二四七部（譜主八十二人），隋唐人物的年譜為三八九部（譜主一百三十二人），五代十國人物的年譜為四八部（譜主三十六人），宋代人物的年譜為六五六部（譜主二百九十三人），遼金元人物的年譜為一三一部（譜主九十六人），明代人物的年譜為七九三部（譜主五百一十六人）。而據清代人物年譜專家來新夏先生的統計，清代人物的年譜有八百餘種。由上面的統計來看，明人年譜是辛亥革命前各個時期人物年譜數量較多者，僅次於清代，而且與之相差不多。年譜的總量多，無疑包含的史料數量必然要大。

其三，真實性較強。明人年譜的作者多是譜主本身，或者是譜主的門生親朋，所記為其親歷、親見或親聞，多真切詳實。有的雖不是譜主的門生親朋，但曾廣泛收集譜主的資料，作過專門研究，所記亦多可靠。翻看明人年譜，可以發現許多僅見於其中而為他書所不載的珍貴史料。如張文麟在明武宗

正德五年處死權闖劉瑾時，奉命協助陝西司主事胡遠監斬，他在自撰年譜《端巖公年譜》中記其事說：

數日後早朝畢，奉旨：『劉瑾凌遲三日，剐尸，梟首，仍畫影圖形，榜示天下。劉二漢（劉

瑾之侄——筆者注）一體處斬。』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于尚書劉先生

（刑部尚書劉——筆者注），曰：『我如何當得』劉回言：『我叫本科（指張文麟——筆者

注）幫你。』予因應之。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邀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

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剐三百五十七刀，

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

入小腹小腿肚，剐畢開膛則血皆從此出。想應是也。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數

刻，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則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

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剐尸，免

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剐尸，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矣。（張

文麟：《端巖公年譜》，《明代名人年譜續編》第四冊第468～470頁）

在這段記事，張文麟不僅詳細記述了權闖劉瑾處死時被凌遲、剐尸的實況，而且對其時凌遲的

刀數規定，也記載得清清楚楚。這些都是其他史書和文獻資料所沒有的。這段記事之所以能夠將這些詳細、明白地記錄下來，顯然是得益於這段記事所在年譜的譜主兼作者張文麟系劉瑾被處死一事的親歷者。這段記事的內容血淋淋慘不忍睹，但從反映明代刑罰制度實況來說，又是寶貴的史料。

明人年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如何使用卻須講究，否則事倍功半。筆者認為利用明人年譜查找資料的方法，基本上有四種。

其一，若查找某人的資料，則直接查閱其人的年譜。這是不言自明之事，不用贅述。

其二，為查閱某人的資料而查閱其他相關人物的年譜。這種方法在其人沒有年譜之時，尤其值得利用。年譜雖是專記一人之事蹟言論，但與譜主事蹟言論相關的人物，也往往被寫進年譜中來，以使譜主言行的背景得以交待清楚。這為研究者利用相關人物年譜查閱某人資料提供了方便。如《明史》載：

朱賡獨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獨相一賡，而又晝接無聞，補牘莫應，此最大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墜，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窮，邊方廢，宦豎橫，盜賊繁，士大夫幾忘廉恥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宇內。輔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効之當寧。如徒

謙讓未遑，或以人言輕懷去就，則陛下何賴焉？』賡乃緣若霖指，力請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萬曆三十五年）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專權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壞田廬。若霖復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意復詆賡及新輔李廷機輩也。（《明史》卷二三〇《汪若霖傳》）

從上引《明史》的這段記載看，朱賡對汪若霖的意見不能說不予採納，而汪若霖卻對朱賡抓住不放，攻訐不已。這是為什麼？《明史》當中並無具體的、有針對性的解釋。《明神宗實錄》對萬曆朝事蹟記載甚詳，其對汪若霖的上述言論亦有記載（《明神宗實錄》卷四三〇、四三三、四三六），但對汪若霖抓住朱賡不放、攻訐不已的原因也無具體的、有針對性的說明。應從何處查閱資料以尋找原因？其辦法之一當是利用明人年譜。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汪若霖其人的年譜，但與其相關的人物朱賡卻是有年譜的。筆者嘗試對朱賡的年譜進行了查閱，果然有所收穫。朱賡的年譜名《茶史》，是譜主所自撰，其萬曆三十五年五月初八日記事稱：

五月初八日，上命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推堪任閣臣者來簡用。先是，余以枚卜請者章二十餘上，上已動念矣，忽一日於余疏中批出，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科臣汪若霖囂於眾

曰：「審爾，則不復會推，命從中出矣。上安曉「恭默」二字，必執政有所欲用之人，故出此旨。」遂因雨電建言：「電乃陰盛之徵，大臣權專政則有此應。」語甚刺余。余又上疏請必會推，始協公論，乃有是命。初，若霖為其座主楊荆巖經營半年，嘗介羅兵部來請，次日又自來。余應之曰：「荆巖乃我門生，才望自宜推用，可保其必推。但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薦，則聖心生疑，反為荆巖累。吾不敢也。」渠唯唯而去。蓋渠謀求於內外之間，已有機械，只虞會推不及耳。

（朱賡：《茶史》，《明代名人年譜》第七冊第26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

由《茶史》的這段記述看，汪若霖之所以對朱賡抓住不放、攻訐不已，乃是由於汪若霖請求朱賡推薦其師楊荆巖人閣任大學士而遭到了朱賡的拒絕。誠然，朱賡作為被攻訐的一方，在其自撰年譜中所記述的其被攻訐的原因，只能看作一面之詞，不能貿然判為確實，但總是提出了一種說法，為後人分析提供了一條思路，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其三，當查找某一類事物的資料時，可以試查曾任職司這一類事物的官職的人物之年譜。如楊博在明世宗在位的後期、明穆宗時期至明神宗即位初，長期擔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的職務（《明史》卷二一二、二二四），其年譜今存有項德楨編《太師楊襄毅公年譜》（殘本，卷三、卷九），許多與兵部尚書、吏

部尚書職掌有關的事物，可在這個年譜中查到其若干資料。比如萬曆《明會典》中記載：

凡錦衣衛官……嘉靖二十九年題准，錦衣衛除皇親帶俸原不管事、達官營操不係管理軍政等官難以考選外，其餘若指揮在所管事，並千戶以下等官，不拘見任、閑住，俱聽本衛堂上掌印正官從公開注賢否履歷，先期送部，臨期會同議擬，與騰驤四衛一併嚴加考選，果有廉能可用，仍舊管事，如行止不堪，一體帶俸革任。（萬曆《明會典》卷一一九《兵部二》）

這段記載說明，錦衣衛之『指揮在所管事，並千戶以下等官』，在嘉靖二十九年後考選時要由錦衣衛的掌印正官與兵部官員共同進行，即『會同議擬』。但錦衣衛掌印正官與兵部官員在『會同議擬』時由誰為主？在什麼地點進行？這裏皆未說明。而讀楊博的年譜，卻可找到部分說明。該年譜嘉靖三十九年記事稱：

十二月壬辰，考選軍政。

前乙卯（嘉靖三十四年）考選，公言：『錦衣衛例應赴部。』陸武惠（掌錦衣衛事之陸炳——筆者注）唯唯。會公丁艱，仍疏免。至是，公執如初，武惠不得已，率屬赴部。而中門不開，詣懇徐文貞，文貞使人言公，令開中門。而儀門之中門仍閉，武惠不得已，從東角門入。

是時，公與侍郎閔公煦、李襄敏公遂皆迎至堂，揖畢，公中坐。武惠以聶貞襄在本兵，自考選過部，且由中入，既至堂復占首席，今公直據首坐，而虛次以待，衷殊不平。及舉筆，公有問，武惠初讓，不發一言，公遂不復與議，去留一自決，為汰數十人。武惠忿沮。（項德楨：《太

師楊襄毅公年譜》卷三，《明代名人年譜續編》第七冊第150～152頁）

這段記載說明，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考選錦衣衛官員時，為主者為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博，進行的地點在兵部。楊博的年譜之所以能部分回答上述兩個問題，完全是由於嘉靖三十九年時，楊博擔任兵部尚書的職務，而考選錦衣衛的有關官員，正是兵部尚書的職掌之一。又如《明史》關於太僕寺寺丞的記載：

寺丞，初置四人。正統中又增八人，共十二人，以一人領京衛，一人領順德、廣平二府，一人領開封、衛輝、彰德三府，九人分領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大名、濟南、兗州、東昌九府驛牧、寄牧各馬匹。弘治六年革四人。正德九年復增一人，專領寄牧之事。嘉靖八年又革三人，共六人分領，三年更代，而以寄牧者令府州縣兼理。隆慶三年又革三人，止設三人，以一人提督庫藏兼協理京邊，二人分理東西二路各馬政。（《明史》卷七四《職官三》）

這段文字只記載了太僕寺寺丞的員數及分工，而其任職資格、升遷前程等並未涉及。但如果查閱楊博的年譜，即可得知若干有關情況。該年譜隆慶三年閏六月記事稱：

丙午，覆太僕寺卿顧存仁崇體統疏。太僕丞多用廢冑，顧公請選科目才望之優者，詔部

議。公言：『太僕丞在《諸司職掌》原係京堂官，例不考覈，與尚寶、光祿丞同，本自尊嚴。惟用非其人，致壞舊體。此後務於主事、推官、知縣內選補，照尚寶、光祿例，內擢少卿，外擢司道，本寺遇缺少卿，令其分攝，出巡則府佐以下俱行屬禮，違者聽呈兵部參處。』從之。（項德

楨：《太師楊襄毅公年譜》卷九，《明代名人年譜續編》第七冊第272～273頁）

這段記載反映了隆慶三年閏六月前後太僕寺丞任職資格及升遷前程的變化。楊博的年譜之所以能反映這些具體情況，不言而喻乃是因為隆慶三年之時，楊博身居吏部尚書之職，而太僕寺丞的任職資格及升遷規定，正屬吏部尚書的職權。

其四，探究明代某一時期影響重大、事關多人的歷史事件，可採用同時閱讀此時期相關人物的多部年譜的方法。明人年譜數量多，這使明代某一時期可有許多人物都編有年譜，從而為後人揭示歷史真相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如明代後期朝臣士大夫門戶之爭非常激烈，倘欲查找其相關歷史事實，即可同時閱讀

顧憲成、高攀龍、葉向高、魏大中、左光斗等多人的年譜。這些年譜不僅數量多從而資料豐富，而且由於各譜作者見聞不一、觀點也有差異，因而所提供的資料還可互相補充質證，便於分析出事情的真相。鑒於明人年譜中關於明代後期朝臣士大夫門戶之爭的資料極其繁多，為省篇幅，茲不轉引。

在利用明人年譜時，除了講究方法外，還應注意如下幾點，否則將影響搜集資料的範圍，甚至被誤導，有礙於詳細準確地掌握歷史真相。

其一，明人年譜的譜名，與其他時代的年譜一樣，多帶有『年譜』二字，但也有不少不用『年譜』二字者。如殷邁的年譜（譜主自撰）稱《幻跡自警》，譜中作者自稱『以生平幻跡，次第直書』，其譜名中的『幻跡』二字，實指譜主的言行。耿定向的年譜（譜主自撰）稱《觀生紀》，作者自撰《觀生紀序》稱：『觀生，觀我生平之履也。』朱賡的年譜（譜主自撰）稱《茶史》，他在全譜結尾處對該譜命名的原因解釋說：『茶史者，余病中自敘行述，略鳴苦心，命曰「茶史」。』姚舜牧的年譜（譜主自撰）稱《自叙歷年》。葉向高的年譜（譜主自撰）稱《蘧編》。金世俊的年譜（譜主自撰）稱《寧我錄》。這些年譜僅看名稱，很難將之與年譜聯繫起來，但卻是地地道道的年譜，並且多半價值甚高。因此，在利用明人年譜時，一定要對此類年譜特加留心，以免漏掉，造成遺憾。

其二，前文提及，明人年譜中很大一部分是譜主或譜主的門生親朋所撰，因而其所記多為親歷、親聞或親見，有真切詳實的優點，對之應充分注意加以利用；但由於作者與譜主有特殊的利害關係，這類年譜中間或出現美化譜主、掩蓋譜主不光彩方面的現象。

其三，當一個人物編有多部年譜時，要儘量將各部年譜互相對讀，這樣常能收到互相補充校正之效。如王守仁有多部年譜，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著錄有三十多部，楊殿珣編《中國歷代年譜總錄》著錄有二十多部。筆者曾將兩部年譜，即錢德洪編、羅洪先考訂《陽明先生年譜》及李贄編《陽明先生年譜》，作過對讀，就發現兩譜有許多可以互相補充校正之處。

其四，對晚出的、甚至是今人所作有份量的年譜不可輕視。一般而言，產生時代越早，文獻的價值越高，但對此不可絕對化。晚出的、甚至今人所作的年譜，倘作者下過大功夫，該年譜很有份量，其價值不應低估。後人往往比前人可以看到更多的資料，這使肯下大力氣的人有可能作出超越前人造詣的優秀年譜。如明末的大科學家徐光啟，自清朝以來多人為之修譜，而筆者所見到的今人梁家勉編著《徐光啟年譜》最為晚出，但其所收集的資料最為豐富，譜文及附注所涉及或引及的文獻約二百八十多種，包括譜主本人著述、與譜主有關的人物的有關著述。同時人或後人對譜主的記載、直接或間接與譜

主生平活動有關的歷史記錄、涉及或引及或影響及譜主學術思想的某些專門書等。梁還對這些資料進行了嚴格鑒別，相當真實、全面、系統地反映了譜主的生平，包括其人、其事、其學以至其時代、其影響、其相關人物等方面的史實。由此看來，倘利用徐光啟的年譜研究徐光啟其人和其他有關史事，這部最為晚出的梁著年譜是不可不讀的。又如明末思想家呂坤，原來沒有年譜，今人鄭涵參考近七十種古今著述，首創《呂坤年譜》。他以近十二萬字的篇幅，對譜主的言行著述、論學交遊、居官行政等，詳加敘述；與譜主有關的朝野大事、典章制度、歷史人物等，亦多有論列；凡譜主言論之有關朝章政典、國計民生足以反映譜主學術思想、政治觀點者，均摘要轉錄，其尤其重要者，則雖長篇鉅制，亦全文收載。這樣一部年譜，雖系今人所撰，但顯然具有相當高的史學價值，是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欲利用明人年譜，不可缺少著錄介紹明人年譜的著作。很可惜，明人年譜未能像清人年譜得到來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這一專著專門著錄介紹那樣幸運，迄今為止，尚無專門著錄介紹明人年譜的專著問世。不過，在若干著錄介紹歷代年譜的工具書中，明人年譜也得到了相當系統、全面的著錄介紹。筆者所見到的這類工具書中，楊殿珣編《中國歷代年譜總錄》和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是著錄介紹明代年譜最詳細的兩部，後者尤其如此。它們雖然難免偶有小誤，如謝書稱張

信民編《曹月川先生年譜》『考月川生於洪武十年』，而查閱該譜可知，實為記作『洪武九年丙辰春正月十三日午時生』。但瑕不掩瑜，這些工具書的著錄介紹大多準確可靠，它們為利用明人年譜者指示門徑，大有裨益。一九九七年又出版了黃秀文主編的《中國年譜辭典》，該辭典共收年譜四一一五部，涉及譜主二四三一人，其中明人年譜三八五部，涉及譜主二六八人，對每部年譜的撰者、版本、收藏單位、譜文特色，以及譜主的生平，皆有扼要介紹。一九九九年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又出版了《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其中收載有明人年譜二七五部。為方便學者個人研閱，自二〇〇三年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又從中陸續輯錄出版了《明代名人年譜》、《宋明理學家年譜》及《宋明理學家年譜續編》，現又整理出版《明代名人年譜續編》，收錄明代人物年譜一〇一種（譜主九十四人），在一定程度上為利用明人年譜者克服或緩解了有關年譜散存而不便查閱的困難。而目前比較充分地利用明人年譜的客觀條件已初步具備，筆者願與廣大同行共同開展利用明人年譜的工作，以充分發揮其史料寶庫的作用，實現其史學價值。

南炳文

二〇一二年十月

(明) 吳國英編 清康熙間刻本

環谷先生年譜